

# 高教动态

2018年第6期（总第81期）

江苏大学规划发展处（教育教学研究与评估中心）编

2018年11月30日

<http://gjs.ujs.edu.cn>

责任编辑：尤俊英

## ★高教新闻

- 2018—2022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会议召开……………2
- 2018 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召开……………2
- 江苏出台研究生导师职业道德规范“十不准” ……………3
- 14 名中国学者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3

## ★教育教学

- 邬大光：我国大学人才培养模式须走出历史惯性……………4

## ★高教视点

- 本科生“增负”道阻且长，高校至少受制三大因素……………9
- 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中国开始成为全球工程教育的“领跑者” ……………11
- 高校严进严出，重在落实……………12

## ★热点评论

- 农学专业回暖，高校何以站稳脚跟……………13
- 高校功能多元但核心是育人：如何让教师安心从教……………15

## ★改革探索

- 山东大学：聚天下英才而用之……………16
- 扬州大学：“翻转课堂”对接智慧教学……………17

## 编者按：

高等教育事关国家发展、事关民族未来，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高校的人才培养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短板。聚焦人才培养，教育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回溯 2018 年，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新时代高教 40 条”的提出、“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的实施，全面振兴本科教育呈现良好开局。

## ★高教新闻

### 2018—2022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 成立会议召开

11 月 1 日，2018—2022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会议在北京召开。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聚焦“培养人”这一根本使命，抓住振兴本科教育这一核心，增强荣誉感、使命感、方位感、紧迫感，为努力实现本科教育全面振兴，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林蕙青主持会议，并宣读了《教育部关于成立 2018—2022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的通知》。陈宝生、林蕙青共同为 111 位主任委员颁发了聘书。

新成立的 111 个教指委的主任委员出席成立会议，全体副主任委员、各分委员会主任委员、全体秘书长和部分委员代表共 1600 余人列席了会议。会上，8 位主任委员代表作了交流发言。经严格审查，新一届教指委最终遴选出委员 5550 人，包括主任委员 111 人、副主任委员 710 人，其中 3611 人是新任委员，占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二。（摘自：中国教育报 2018-11-02）

### 2018 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召开

11 月 2 日-4 日，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主办的“2018 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在宁波召开。国内众多教育界大咖亮相，与会的专家和学者代表共 1100 余人，近 20 位中外专家学者作大会

报告，共同探讨“双一流”建设，如何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本次论坛设有三个平行分论坛，分别以“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路径选择”为主题展开专题研讨，30余位国内外高等教育领域专家学者作专题报告。

论坛同期举办的博士生论坛及博士生导师报告会上，近30位博士生分享了研究成果，2位博士生导师作专题报告，10多位博士生导师作点评和指导。（摘自 中国教育在线 2018-11-14）

## **江苏出台研究生导师职业道德规范“十不准”**

江苏省学位委员会、省教育厅日前联合出台《江苏省研究生导师职业道德规范“十不准”（试行）》以及《关于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的意见》。这是江苏首次就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专门出台意见，从正面引导和负面清单两个角度发力，构建研究生导师队伍立德树人长效机制。

此次出台的《意见》首次在行文上明确了研究生导师的基本权利，如招生参与权、培养自主权、育人推荐权、管理建议权等，并强调研究生导师要实施评聘分离，如果培养质量出现严重问题至少3年不得招生。

针对此前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此次出台的《十不准》还拉了“负面清单”，划定了研究生导师的职业道德规范“红线”，包括不准发生学术不端行为、纵容所指导的研究生发生学术不端行为；不准侵犯研究生学术权益，在有关学术成果中强行安排无关人员署名，或不按实际贡献排序署名；不准疏于指导、放任管理，长时间不指导研究生的学术活动；不准安排研究生承担属于私人领域和家庭生活的事务，或强行安排研究生在与自己有利益关联的单位从事与学业无关的劳动等内容。

根据《十不准》与《意见》，江苏今后将把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情况纳入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建设评价体系，每3年开展一次研究生导师指导质量抽评，评价和调查结果作为研究生招生计划、省级相关项目安排的重要依据。选聘研究生导师时，凡存在师德问题的一票否决。（摘自 中国教育报 2018-11-16）

## **14名中国学者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第28届院士大会27日在意大利开幕。大会主办方当天宣布，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46名科学家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其中14名为中国大陆科学家。另外，4名大陆科学家获得2019年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奖。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成立于1983年11月10日，总部设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是非政府、非政治和非营利性的国际科学组织，致力于支持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科学研究，现有院士1200余名，其中232名来自中国大陆。（摘自 中国教育报 2018-11-29）

# ★教育教学

## 邬大光：我国大学人才培养模式须走出历史惯性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这是人们的共识。但这个“深水区”指的是什么，似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容质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进行了若干重大领域改革，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同时也存在一个事实，与高等教育其他领域改革相比，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并不能完全回应社会期待。“钱学森之问”之所以长期成为社会对高等教育的诘问，就是一个明证。由此我们必须承认一个现实：高校的人才培养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短板。当下有必要对我国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深刻反思。

### 一、我国大学人才培养已成为“短板”

前不久，去世界卫生组织，见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他说世界卫生组织有7000余雇员，但中国雇员只有40余人。目前，中国每年交给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费大约2500万美元，从2018年开始就要交5000万美元。但是，我们交的钱和派出的人数相比，是典型的“代表性缺失”。他还说在100余个世界上的国际组织中，中国基本都存在“代表性缺失”的现象。他认为我国选派不出高水平的人在国际组织任职，关键就是人才培养质量有问题。反观日本二战之后，共产生25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本科全部是日本本土大学毕业，在国外读硕士的只有2个，在国外读博士的只有3个。这反映了日本大学人才培养的竞争力。

无独有偶。过去三年，有幸参加了国内六所“985工程”高校的审核评估。教育部评估中心对这一轮“985工程”高校的审核评估，采取了一项新举措，即邀请外国学者参加。这些外国学者大部分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或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学者，分别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日本。这些外国专家几乎都是第一次参加我国一流大学的审核评估。在深入考察和评估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我国“985工程”高校的硬件已经是世界一流，其条件之好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让他们感到震撼和羡慕。然而，当这些外国学者深入到教学第一线听课、召开学生座谈会、调阅各种教学文件时，他们又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一流大学的本科人才培养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无论是在教育理念、培养模式和教学手段上，都还存在很大差距。最为突出是学生普遍缺乏批判性思维、基础不够厚、口径不够宽、跨学科程度弱、国际化程度低。

其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芝加哥大学副校长在某大学评估反馈会上的发言。他说：“贵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领袖人才、创新创业人才，这种远大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一流大学应有的担当。但不知贵校是否考虑过在二十年或者最多三十年之后，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时，贵校今天培养的人才能够治理世界吗？”他的话让我非常震惊，在我的认知里，至少我还没有这种意识和准备，或者说国内一流大学的管理者似乎还都没有想过这个话题，都还没有想到如何让我们的学生具有治理世界的能力，更没有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提前做些准备。在我们的思维方式里，为国家培养人才是天经地义，为世界培养人才为时尚早。可是西方学者已经想到了这个命

题，并且成为十分关注的话题。仅从提出这个命题的角度看，我国一流大学人才培养的观念明显缺乏超前意识。今天在读的大学生，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二三十年后，当他们到了40岁—50岁的时候，我国有可能已经是世界第一经济体，但我们今天培养的人才，无论是视野还是能力，显然还不具备治理世界的能力。

另一个足以引起深思的，是外国专家对中国大学课堂教学的观察。2016年在某大学评估时，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副校长在听了几节课之后说，她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在中国一流大学的课堂上，学生与教师的交流互动如此缺乏，基本上是教师讲学生听，此种现象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和批判能力？当我们问她什么是好的课堂教学时，她给的答案是：大学课堂教学有五重境界：第一重境界是“安静”，即课堂上很安静，学生不发言；第二重境界是“回答”，即老师课堂上提出问题，学生们只回答对或不对，是或不是；第三重境界是“对话”，即老师与学生之间有一定的互动；第四重境界是“批判”，即学生会老师的讲授内容提出质疑；第五重境界是“辩论”，即学生与老师互相反驳。虽然在审核评估专家听课时，课堂的教学效果比平常好，但显然与外国学者希望看到的还有很大差距。

为什么会这种现象，原因众多，这些外国学者也给出了部分答案：即我国的一流大学对科研的重视远远超过教学，我国的一流大学普遍还没有感觉到人才培养的压力，还没有深刻体验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诚如芝加哥大学副校长在某大学反馈会上说：“我相信中国一流大学的科研指标在国际社会的各种排名榜上会持续上升，但是中国一流大学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不同步。一流大学必须认识到，当其科学研究达到一定水平时，人才培养就成了核心竞争力。”他们普遍建议：在中国一流大学的硬件已经得到明显改善的背景下，必须要重视人才培养，只有在人才培养上具有引领作用的大学才是真正的一流大学，才可以称得上是一所卓越的大学。一位几次参加评估的外国学者指出：中国的一流大学在人才培养上似乎有许多亮点，但都是在模仿国外大学的做法，没有中国本土文化特色。尽管这些外国学者对我国一流大学人才培养上的评价有些“尖刻”，但指出要害，具有深刻的“预警”意义。

## 二、对我国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反思

前不久，厦门大学迎来了教育部口腔医学专家组，考察我校是否具备举办口腔医学专业的条件。由于汇报人对口腔医学与“牙科”的概念不清，在汇报中，经常会用“牙科”这个概念，该组长纠正说，在中国，这个专业不能叫牙科，只能叫口腔医学。问她为什么？牙科和口腔医学有什么区别？该组长以扫盲的口吻说：牙科是欧洲和北美的称谓，口腔医学是苏联的称谓，这一提法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就已经明确。

事实上，不仅仅在口腔医学，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大量概念中，有许多称谓和制度设计都来自苏联，例如专业、教学计划、教研室制度等。但是今天，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步伐不断加快，人们发现很多过去习以为常的概念，在翻译时似乎很难找到与之完全对应的单词。以“专业”这一概念为例，翻译成英文可以有“program”、“major”、“minor”、“specialization”

等不同译法。不仅仅在称谓方面，在对外交流中，很多高校在自我介绍时，常会亮家底似地提到学校有多少个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多少个国家重点学科、特色学科。这一介绍有时会让国外专家很不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位”？此种现象既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阶段性有关，也与我们对高等教育理解和认识有关。但其中，苏联教育模式的痕迹和惯性是一个重要原因。

回眸历史，上个世纪 50 年代，在苏联专家指导下，我国高等教育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造。这种改造从宏观管理体制到微观教学领域，几乎无所不在。从大规模院系调整为切入点，形成部委举办高等教育的格局，直接对接国民经济发展需求；在中观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上，建立了以学校-系-专业-教研室的教學组织体系；在微观教学体系上，从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材直接采用苏联蓝本。根据当时《人民日报》的一份资料，到 1956 年底止，苏联专家们已编写教材 629 种，帮助中国教师建立实验室 496 个，资料室 192 个，实习工厂 34 个。到 1957 年上半年止，苏联专家为中国培养研究生和进修教师 80285 人，专家们开课课程或帮助基础薄弱课程开课 899 门，指导中国老师讲授的课程 443 门。

可以说，苏联教育模式奠定了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框架。今天人们熟知的高校组织架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进度表、教学工作量制度、教学编制等众多最为基本的教学管理制度，都是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形成的。尽管改革开放后，我国大学的组织架构和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改革，但在人才培养和教学领域深处，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其中两个方面尤为明显：一是高度集权的计划模式；二是高度专门化的教学体系。

其一，根据有计划按比例培养各类专门人才的思想，1954 年，我国参考苏联高校的专业目录制定了第一个国家专业目录《高等学校专业目录分类设置》。这一专业目录问世后，经过历次修订，不仅成为高校设置专业的指南，同时也是国家制定招生计划、就业计划的重要手段，也成为高校配置资源、安排教师、课程、建立实验室的依据。这样，专业目录从原来的知识分类变为行政管理手段。其二，为了迅速高效地培养行业急需求人才，全国以专业为单位，推进统一教学计划、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教材，甚至统一教学管理，由此在全国高校形成了非常一致的专业教育模式。而在高校内部，以专业为单位建系，以系为单位组织教学和管理，形成了专门化的教学体系。从二者关系而言，专门化教学体系适应了当时集权计划经济的发展需求，而集权的计划模式又强化了专门化教学体系。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穷国办大教育的国家，高度计划的专业教育模式无疑培养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急需人才。但当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正从传统计划模式转向市场模式，并且市场在资源配置将起决定性作用时，当我国正从高等教育大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时，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式模式和过于专门化的教学体系，就会显得与现实有诸多不适，这些不适需要从源头上进行反思：

其一，关于人才培养目标的反思。过去一直强调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但在我国强调社会转型、产业升级、提倡创新的大背景下，我们正在面对大学生所学专业与就业职业的匹配度不断

下降的现实，尤其是在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我们是否还要强调专业与就业的对口？强调还是说需要从终身教育的视角审视我们的人才培养问题，调整与改革专门化教育的目标与模式。

其二，关于专业体系的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说，专业体系是学科知识体系的一个“横断面”，需要从不断变动的学科知识体系截取相对成熟的知识体系组成专业。对于一个科技文化水平处于相对落后的国家，依赖于一种相对稳定的专业分类，对于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无疑起到稳定和保障作用。相反，当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且需要突破时，就不能完全被人为的学科专业体系限制。特别是在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发展推动下，新兴学科专业、交叉学科的强劲需求已经对传统专业模式提出挑战。这种背景下，我们是否还要固守某些传统，还是需要回归学科专业之本来面目？

其三，关于教学过程的反思。传统专业教育模式说到底，就是把教师安排到各个专业生产线上，并以集约化的班级授课进行知识传授。但在今天，学生的多样学习需求以及知识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传统这种知识导向的传授方式已经暴露出它天生的缺陷。因为今天，社会需要的是一种能力标准，一种尽快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是一种增值的价值观。这种转变，需要大学给予学生更多的个性化帮助，需要整个课程体系与教学过程转移到学生的能力与素质的培养上。

其四，大学组织体系的反思。基于大学的基本职能是人才培养，我国高校在照搬苏联模式的过程中，建立了学校-系-专业-教研室为基本框架的教学组织体系。但这一体系在强化科研的过程中，人才培养的功能遭到弱化，大量新型的科研组织不断涌现，使得大学内部的治理体系已经异常复杂，甚至大学人才培养的基本职能组织正在遭到不断“撕裂”，新型教学组织的建立已成为当务之急。如何回归大学本原，从最根基上建设现代大学教学组织和制度，这既是一个管理问题，也是一个基本价值判断。

### 三、走出大学人才培养的历史惯性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多元化的需求，我国大学人才培养一直试图突破苏联体系。自世纪90年代以来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及后来的院校合并，解决了单科性大学以及中央部委举办行业大学的弊端；高校招生就业体制改革推了动高校面向社会和市场办学；高校内部进行的校院二级管理体制的改革，为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奠定了外部条件。与之相伴随的改革还有大类招生、分类培养、主辅修制、拔尖计划、甚至设立本科生院等等。但客观地讲，尽管高校在外部管理体制、招生就业体制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在人才培养的这个根本问题上，高校推进的许多改革都是在原有体系上的修修补补，都没有跳出原有的苏联框架，没有从根本上撼动原有的教学体系。

以学分制为例。我国从上个世纪80年初就开始学分制改革，但时至今日，学分制仅仅是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存在，并没有真正触及学分制的本质：即学习自由，包括选课自由、选专业自由以及选择学习进程自由。根据我们课题组对全国718所高校抽样统计，各高校学生转专业

人数占在校生人数平均不到 2%，占招生数的比例也只有 7.4%。根据对全国 820 所毕业率和学位授予率抽样统计，分别平均达到了 97.75%和 96.90%。而与美国高校相比，排在前 50 名高校六年毕业率平均只有 89.7%，而排在 51-100 名高校六年毕业率平均只有 56.2%，当然，如此之低的毕业率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教育大国，不一定合适。但是，如此之高的毕业率和学位授予率也不是学分制要达到的目标，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学分制还是一种“皮毛”。又如，多年来一直倡导宽口径、厚基础，但实际上，高校的学科专业的壁垒依然存在，专业设置越来越细，课程开设越来越专，课程结构越来越僵化。究其原因，乃是在计划思维下，学科专业体系已经变成一种行政体系、变成一种资源配置体系、变成一种学术组织体系。这些例子说明，尽管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用人环境发生变化，因之高等教育招生体制在变化、就业体制也在变化、宏观行政体制在变化，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在变化，但是我们的人才培养、教学计划、课程方案、尤其是大学课堂的教学模式却相对滞后，或者说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之所以未能发生变化，除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外，大学自身发展的历史惯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回顾我国高等教育百年史，民国时期的大学主要是学欧美。比如蔡元培是从德国回来，因此北大的理念就是当时德国大学的理念；梅贻琦是从美国回来，因此清华大学主要是美国模式；厦大首任校长林文庆是从英国爱丁堡大学回来，因此厦门大学有点像英国大学的模式。建国后，全盘照搬苏联，原来的欧美体系淡出了我国大学。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并没有号召学习北美的教学模式，但是我们的大学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开始向美国靠拢。可是没有想到，北美的教育模式与苏联的教育模式是二个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因此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进程中，就出现了大量的“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现象。例如，重修制度是学分制一个重要特征，补考是学年制的另一特征。但只有我国，在既有重修和补考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毕业前的“清考”现象，使“清考”成为我国乃至国际上一种独有的考试制度。这一现象说明，传统习惯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常常制约或束缚着人才培养的创新与发展。

虽然我国高等教育模式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向美国模式靠拢，但从现实看，骨子里还是苏联模式在发挥作用。因为我们的老师都是在苏联教育模式下接受教育的，我们也自然地传承这一模式，以至于我们忘了我们依然被禁锢在苏联模式中。这种历史惯性包括：课堂教学惯性、专业教育惯性和学科教育惯性。这种惯性已经被模式化和固化，且进入了集体无意识状态。今天有相当一部分老师从进入大学起，就被绑在某门课程上，被绑在某个专业上，被绑在某个学科上。今天有相当一部分老师从进入大学起，就被绑在某门课程上，被绑在某个专业上，被绑在某个学科上。当一个大学老师被这样过分“专业化”后，这个学校的跨学科水平，这个学科的跨学科水平，这个专业的跨学科水平，包括这个老师的跨学科水平，一定是低的，也无法保证通识教育的高水平开展，更遑论培养出来的人才如何具有跨学科的知识结构。从这一意义上说，走出大学人才培养的历史惯性，就是要走出苏联模式，这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教育强国的大势所趋。



当然辩证地讲，苏联模式给我国大学教育留下了许多宝贵财富，例如教研室制度、实习制度等等。所以跳出这一模式并不意味着抛弃一些优良传统，相反，我们更希望在改革进程中必须深刻认识这些历史惯性对于人才培养模式的影响。从远的方面说，我国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一直没有离开科举考试的阴影。从近的方面来说，我国的人才培养一直没有摆脱苏联的阴影。实际上，世界上的大学有三种体系：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体系，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体系和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体系。当英国在世界上最强大的时候，世界上有许多国家跟着他走。美国最强大的时候，都在跟着美国走。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跟着走。追溯这段历史，不难看出，作为后发外生型发展模式的中国高等教育，过去也一直倡导洋为中用，但在国家相对落后的背景下，大学更多是采用一边倒的全盘接收。殊不知，当年学习苏联是因为冷战格局的驱使，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产物。

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看，一流大学对世界的高等教育影响不仅仅在科研方面，更能体现引领世界潮流的，往往是教育制度创新。其中典型的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书院制、哈佛大学的选课制、德国柏林大学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相比之下，我国自启动“211工程”和“985工程”以来，科学研究得到了空前重视，且收到了显著效果。但人才培养似乎始终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短板”。仅从当前国内一流大学招聘人才的要求来看，几乎都聚焦在具有留学背景的“海归”身上，尽管人们也在反思一味追求“洋标准”的负面影响，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流大学对自身人才培养的不满意，或者说不够自信。教育自信是文化自信的基础。今天当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着的是全球化的大潮，伴随着中国将成为世界强国的未来，我国的高等教育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一条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一定要大学走出人才培养的历史惯性，高等教育战线不仅要自我觉醒，意识到自身的软肋和不足，还要意识到要培养引领世界的人才就必须跳出原有的人才培养体制与模式。总之一句话：大学必须守住人才培养这个根。（摘自：江苏高等教育网 2018-11-28）

## ★高教视点

### 本科生“增负”道阻且长，高校至少受制三大因素

今年召开的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指出，对大学生要合理“增负”，提升大学生的学业挑战度，合理增加课程难度、拓展课程深度；要严把出口关，改变学生轻轻松松就能毕业的情况，真正把内涵建设、质量提升体现在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成果上。

给本科生“增负”是中国高校教育现状的倒逼。曾几何时，大学校园里，本科生上课开小差、玩游戏、手机刷屏现象比比皆是，一些本科生甚至逃课在宿舍睡大觉，无所事事地混日子。

尽管如此，绝大多数本科生仍能顺利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这种状况亟待改变。

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人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法宝，高校给本科生“增负”有助于培养各类高级专门人才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现；有助于增强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有助于提升学生个人和家庭的幸福指数。

高校给本科生“增负”虽意义深远，但“增负”的有效实施“道阻且长”，至少有三大困境制约着高校“增负”的前行。

困境之一，“快乐的大学”这种认知营造了不良的舆论氛围。“混大学”成为一些大学生心照不宣的秘密，认知偏差和社会各界选择性盲视悄然消解着高校给本科生“增负”的努力。

困境之二，高校未能给潜心教书育人的教师以足够的支持。高校教师职称评审侧重论文、课题和各类科研获奖等“业绩”，那些本来热爱教学的教师不能不考虑职称晋升，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科研中。教师对本科教学投入不足，难以产出让学生收获满满的“金课”。

困境之三，高校对人才培养工作投入不足。高校未能给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教学提供便利条件和充分的物质保障，影响学生的学习激情和学习效果。

尽管当前中国高校“增负”面临一些困境，但仍有突围之策。

各类媒体积极作为，消解不良社会舆论对“增负”的干扰。当前社会上流行着“高中玩命学、大学尽兴玩、人脉比知识更重要”的价值观，各类媒体要大力宣传大学生刻苦学习、砥砺成才的典型案列，积极报道高校给学生“增负”的成功做法，呼吁社会各界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大学生成长发展的环境创建，防止不良社会舆论与本科教育“增负”相抵触。各类媒体要努力在高校和社会各界之间架起合作共赢的桥梁，促使社会各单位各部门积极参与到高校人才培养工作中，帮助学生在实践中应用知识、创新知识、锻炼成才。

教育行政部门要降低高校办学绩效评价中的科研比重，促使高校回归育人本位。高校忽视本科教学的根本原因在于绩效评价指标中科研比重过高，教育行政部门对高校的评估、社会评价机构对大学排名均对高影响因子的论文、科研课题、荣誉奖励以及资政报告赋予很大的比重，各类高校为了在评价中取得好的排名不得不鼓励教师倾心科研。教育行政部门务必要降低各类评价中的科研比重，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在评估指标体系中的比重。唯此，高校方能切实扭转重科研、轻教学局面，让本科生的“增负”真正落地。

高校要降低不同职称等级之间的待遇级差，引导教师安心从事本科教学。当前，很多高校为了鼓励和促使教师多出科研成果，在职称晋升中加大科研的比重，同时拉大不同职称等级之间工资待遇的差别，导致很多热心教学的教师投身科研，忽视本科教学工作。为扭转这种不良局面，高校要及时缩小不同职称等级之间的工资待遇差距，杜绝不同职称等级之间工资待遇差别过大的现象，引导教师热心从教、安心从教。

高校要加大对本科教学工作的投入，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高校要从为国培养英才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高度去重视本科人才培养工作，努力从办学经费到场地设施、从人

员配比到器材配备全面升级优化，务必实现本科生自主学习有空间、专业训练有设施、团队研讨有场所、社会实践有基地，让本科生“增负”有充分的物质保障。

如此，各方齐心协力，实现本科生“增负”在思想上有共识、制度上有支持、物质上有保障，让本科生“增负”真正在大学校园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摘自 中国教育报 2018-11-20）

## **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中国开始成为全球工程教育的“领跑者”**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扑面而来，引发、重塑、颠覆、重构、改变，技术和数字化在改变一切。工程科技改变世界，工程教育领跑创新，全世界工程教育者必须回答：我们准备好了吗？”在日前举行的“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工程科技人才培养暨第十三届科教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作了《新工科：高等工程教育的未来——对高等教育未来的战略考虑》主题报告，他表示，“当前，中国开始成为全球工程教育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从某种方面来说，我们已经开始领跑和引领。”

### **我国工程教育总体状况如何？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中国经验**

“我国高等工程教育总体可以概括为 5 个三分之一和 1 个 90%，整体类型多样、专业齐全、区域匹配。”吴岩介绍，工科专业类 92 个，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工科专业 630 种，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工科专业布点 1.8 万多个，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在校生、毕业生人数也占总人数三分之一；90%以上的学校都开设工科。

2016 年 6 月，我国正式加入国际工程教育“华盛顿协议组织”，意义深远，影响重大。吴岩用“六个一”总结：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我国从模仿到比肩而行；一张通行证——我国毕业生与国际学位互认，有了走向世界的通行证；一套新标准——我国教育标准与国际实质等效；一张入场券——为中国工程师获得国际职业资格提供资质；一个新声音——制定国际标准时有中国声音；一个新跨越——中国逐渐从教育大国走向教育强国。

“中国工程教育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基础支撑平台，为建成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提供战略引领力量，也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中国经验。”吴岩表示，工程教育的中国模式有五个特点，一是生源优秀，工科专业依然吸引许多优秀学子；二是工科毕业生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最大体量，也是全世界的最大体量；三是中国工程教育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高度耦合；四是中国工程教育注重理工结合；五是在全世界率先探索提出新工科。

### **高等工程教育未来将走向何处？新工科建设要立足当下、瞄准未来、主动变革**

“新工科既包括新的工科专业，又包括工科的新要求。前者指一个全新的领域，后者指传统工科专业的理念、内容、标准、方法技术都需要更新改造。”吴岩强调，新工科建设要立足当下、瞄准未来、主动变革，要把学科导向变成产业需求导向，破除专业分割壁垒进行跨界交叉融合，把被动适应变成主动支撑引领。

中国的“新工科运动”如火如荼，吴岩介绍，新工科理念正在形成高度共识，612个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组成的30个项目群正在加速推进，大数据、机器人工程、智能制造、智能医学等新工科专业蓬勃兴起，“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等加快推进新工科建设的政策相继出台，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现代产业学院、未来技术学院等新工科模式正在成型。依托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平台，2018年上半年行业、企业方面支持新工科建设的资金和软硬件支持达42亿，今年预计将超过100亿。

吴岩强调，创新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下好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先手棋，必须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新工科与新医科、新农科交织交融、相互支撑，新文科为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注入新元素，“四新”是下一轮高等教育改革的先行者、探索者、引领者，是全球共同的责任、共同的探索、共同的行动。（摘自 人民网 2018-11-15）

## 高校严进严出 重在落实

本学期初，教育部发布《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要求加强学习过程考核，加大过程考核在课程总成绩中的比重，严把毕业出口关，严进严出，改变本科“严进宽出”的弊病。学生补考不过即失去学位。

其实，“留级”“警示”“试读”“本转专”……为了严控“出口”，不少高校对于“不合格”的本科毕业生处理办法进行了严格的政策规定，且有不同形式的执行。但是力度不够各行其是，这是教育部发文“狠抓”统一执行的根本原因。

教育部领导提出，要让大学生打游戏，睡大觉，谈恋爱；部分教师“认认真真培养自己，稀里马虎培养学生”的日子一去不复返。那么我们就得先让大学的领导和教师首先警醒。上边说了无数次，大学要教育第一科研第二，但是不少学校没有执行。多少位教授走进课堂教了本科？就拿每年的教师考评来说，有多少学校是以教学优劣评价教师的？又有多少教师因科研不达标而考核不过、评不上职称的？多少教学出众的教师被学生崇拜追捧，但是在同事面前却灰头土脸直不起腰，此种倾向掌门人最清楚。

学生从万般煎熬的应试中来到快乐的大学，他们突然发现自由了逍遥了解放了。毛病出在大学课堂的放任与宽松。教师精力不投入，水师、水课带出的自然是水军。这三水再加上考试、补考的人情与放水，个别的虽然受到了惩罚，过关的也多有侥幸的水生。

再则，共青团组织的思政、文体、公益活动风生水起搞得都好，是否在本科学业的学业上也多予关注。尤其在学习精力的分配上给予宣传教育与引导，让出色的共青团员也成为学习优秀的楷模。若此，其作用、效益、影响巨大，别具开拓性与标志性。（摘自 北京晨报 2018-11-20）

## ★ 热点评论

### 农学专业回暖，高校何以站稳脚跟

农学专业真要卷土重来了吗？2017年末至今，不到一年时间，国内众多高校先后成立农学院，其中不乏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知名院校。

在此之前，不少农学院与大学经历了分分合合。上世纪50年代的高校院系重组，农学院脱离高校另组农业院校的情况比比皆是。

如今新一批农学院在各高校筹建，无论背后原因是政策变化、社会经济转折或其他，若想在高手林立的环境中拔得头筹，势必要明确新成立农学院的发展定位。对于农学热兴起背后可能存在的重复建设、就业遇冷等问题，也有学者表示担忧。

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以来，新建或成立的农学院共有10所。

#### 转向新发优势

今年10月，教育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农科教结合 实施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下称《意见》）。其中提到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提升现有涉农专业，在未来5年建立多类型、多样化的农林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完善农科教协同育人机制。

“与普通高校农学院相比，科学院更能发挥科教融合的优势。”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下称国科大）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导师傅向东表示。进入国科大的研究生，首先要完成一年的规定学习任务，然后再进入各个所实验室开展课题研究。新成立的农学院则将涉及不同农业科学的研究所资源整合起来。对于其他院校成立农学院的举动，傅向东表示，院校间存在相对竞争，但“蛋糕足够大”，“现在农学院刚成立，与其他院校完全没有交叉不太可能，因此更要明确发展重心，找准侧重目标”。

在傅向东看来，国家建设“双一流”学科势必影响到新一批农学院的建立，但另一方面，储备农业科技人才的市场需求也比较大。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士林鸿宣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以往的农业大学更侧重应用，新成立的农学院应更注重基础研究。“现在农业基础研究人才还是少，长远来看，培养基础研究人才还是很有必要的。”

#### 站稳脚跟

宣布成立农学院后，各个高校建院进度不一。如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早在2014年就开始筹建，2018年正式成立后，频频见到学院研究团队取得科研成果的消息。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教授黄季焜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透露，在学院正式成立之前，自己就参与了农业经济管理教研团队、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下称CCAP）等的筹备工作。

目前，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已有教研人员9位、博士后5位、研究助理20多位、博士研

究生 18 位。据黄季焜介绍，CCAP 在过去一年中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部委和中国工程院等项目 16 个。

今年 10 月，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未来北大还将正式招收相关专业的博士生。

为吸纳人才，有院所直接拿出“真金白银”的诚意。

今年 5 月，郑州大学与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棉花所（以下简称中棉所）联合发布招聘公告。公告指出，将针对“绿色高效农业”一流学科发展需要，在作物遗传育种、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等 6 个相关学科领域招聘博士后。这份全年有效的招聘计划还明确提到，符合条件的博士后聘用后年薪可达 15 万~35 万元。达到双方培养要求的，可同时获得两家单位的绩效奖励。

郑州大学农学院首任院长、中棉所所长李付广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新时代发展农业科学，目光不能仅局限于传统概念中的第一产业，应更聚焦现代农业的发展需求。对于公告中提到的待遇条件，他表示：“现在年轻的博士不缺体力、不缺智力、不缺奋斗精神，但他们普遍缺钱。我们就是要给这样的人才提供相对宽松的生活条件，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李付广还表示，高校人才条件加上研究所的科研条件，有望为建立创新型农学院提供良好基础。

### 隐与忧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研究员刘胜毅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国家对农业高层次人才的需求非常旺盛，现在大学，包括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官方就业率基本在 90% 以上。但到农业农村一线的毕业生，远不能满足农村当地或国家需要。”

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李奇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为了获得某些利益，“一窝蜂”的发展方式并不少见。“这应当引起政策制定者的足够重视。特别是公立院校应用型学科，其发展规划应与国家、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有更紧密的联系。”李奇说。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培养专业对口的农业人才，需要在学科方向上下一番功夫。“现在国内农业学科发展与西方国家相比还是很落后，国内需要大量高端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傅向东表示。

另一方面，农学作为一个多学科领域，的确更具科研创新潜力。在李奇看来，如何建立安全、可持续的农学发展模式，是发展中的系统问题。“我国只是刚解决了温饱问题，怎样吃得好、吃得安全，这些问题还远没有解决。”此外，农业科学作为实践性极强的专业，需要足够专业的实验场地和器材。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新忠曾与研究者对国内 36 所高校农学专业进行调查，发现实践基地面积不足、位置偏远是现有农学院的“通病”。因此，新成立的农学院能否提供足够资源，解决设备、场地问题，也有待观察。

李奇表示，对有条件、有需要的院校来说，发展农业科学是理性选择。同时，政府的规划、审核、监管和质量保障部门还应该在各个环节充分地履行各自的职责，从而最大限度地把潜在问题消灭在萌芽中。（摘自 中国科学报 2018-11-21）

## 高校功能多元但核心是育人：如何让教师安心从教

### 让教师安心从教是根本之道

高校的功能虽是多元的，但核心是育人，因此，让教师安心从教是高校发展的根本之道。安心从教之心来自从业者的一颗安静之心、安然之心和安适之心。因此，只有真正热爱教学、热爱学生的教师才能始终保持心静安宁、淡泊名利，不急功近利，忠于本职工作，自豪并享受“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身份。这是教师安心从教的根基。

但在如今复杂的社会环境下，仅靠教师的自律是远远不够的，制度化保障是安心从教的重要保证。相应的制度设计至少考虑以下两方面：一是能让真正热爱教育的教师不为五斗米折腰，有与职业身份相匹配的生活保障，享有社会尊严，能够从评价机制中得到应有的肯定，并有顺畅的职业发展空间；二是制度安排能有效筛查和惩戒缺乏职业道德的教师。同时，对于高校教师而言，教学是第一职责，不能以科研替代教学，不能鼓励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更不能歧视教学。否则势必造成教师的困惑之心、浮躁之心和矛盾之心，难以安心从教。

### 既要底线约束，又要完善制度环境

如今，全国已掀起师德建设的热潮，各高校陆续在制度规范中加大了对师德的重视力度，提出了师德败坏零容忍的第一原则。这是一个底线原则，对于绝大多数教师而言，他们还需要一个尊重教师、尊重知识、尊重教学的制度和人文环境，在这方面还需要做出更大努力。

在许多高校的评价体系中，教师们不得不面对教学和科研之间的两难选择，承受着巨大压力。一些高校急功近利，力推以企业经营之道来提高科研产出的管理方式，虽然在短期内增加了科研产出，却给高校教学和科研的良性发展造成了损害。这种管理方式和评价体系导致教师对教学的轻视、忽视，甚至歧视。在科研一边倒的评价机制中，年轻教师主要面临着“非升即走”的科研压力，助长了“轻教学、重科研”的风气，也助长了一些教授不安心教学、过于追求学术名利场各种“头衔”的风气。

事实上，在高校，一门课程的教学须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只有教师不断保持专业知识的更新速度，确保课程内容的丰富度、授课形式的创新性，甚至要精心挑选推荐给学生的每一本阅读书目、每一篇参考文献，才能保障学生较高的课堂参与度和高质量的教学效果。

然而，现在高校教师所面临的是，一方面教学的时间成本很高，但投入的精力难以充分体现在工作绩效中。基于高校目前的职称评定体系，核心要求在于科研，而在教学方面，一般只要达到一定量的教学时间，不发生教学事故，就能达到职称申请的基本教学标准。相比科研标

准，职称评定中的教学标准相对较低，教学质量方面的考量也缺乏有效的评价指标。

因此，对于不少教师而言，最大的困惑在于，将主要精力投入科研的老师往往能获得职称晋升，职业发展顺利；而将教学视为主要责任的老师，虽可能得到学生的广泛好评，但在平衡教学与科研方面存在一定困难，晋升之路往往比较艰难。当然，也有一些教师能够很好地平衡教学与科研，两方面都展现出发展优势，但这毕竟无法代表大多数高校教师的情况。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现实挤压了希望安心从教教师的上升空间，因此在取舍之间，一些教师会选择能让个人职业得到快速发展的途径，与此同时，也给予了那些缺乏职业道德、只追求个人名利的教师以投机取巧之机。

### 让教学和科研融通

毋庸置疑，育人是高校的根本，师德是教师的根本。高校应以教师为本，教师应以学生为本，学生应以学习为本。

只有消除高校急功近利的制度安排，才能消除教师的不安和浮躁之心，真正实现安心从教。只有真正形成尊重教师的风气和氛围，社会才能真正尊重知识，人类才能获得持续不断的发展动力。因此，高校要不断调整和创新教师评价机制，进一步提高教学标准；通过制度，加强教学和科研之间的融通，鼓励和激励教师将科研成果融入教学之中，并能反映在评价指标之中。

（摘自 江苏高等教育网 2018-11-24）

## ★改革探索

### 山东大学：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完善杰出人才体系、实施分类管理和分类评价、重视专职科研队伍建设，在体制机制上努力让每一位人才放心；在软件、硬件、人力、政策、资金上加大支持，在条件保障上努力让每一位人才舒心；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改善教师工作生活条件，在生活待遇上努力让每一位人才安心。”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近日在山东大学第三届齐鲁青年论坛上说。

齐鲁青年论坛已成功举办三届，在海内外知名度日渐提升，学科领域不断扩展、参会人数逐年增多，已成为山东大学近年来吸引人才的重要措施和平台之一。山东大学第十四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大力营造尊重人才、爱护人才、服务人才、成就人才的良好生态环境，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山大通过召开人才工作专题会议，研究剖析学校人才队伍建设的体制机制束缚，陆续出台《山东大学关于深化人事人才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和9个具体工作方案，在人才体系建设、多元考核评价、博士后队伍建设、薪酬分配制度等方面深化改革，取得了突出的成效。

除了以“齐鲁青年论坛”品牌影响力，邀请海内外青年人才来校交流之外，还制定《山东大学海外人才工作站管理暂行办法》，建立一整套人才集聚的举措，打造了立体化的引才机制。



山东大学于 2018 年 5 月出台《山东大学博士后队伍建设改革方案》，将博士后队伍分为特别资助类、重点资助类和项目资助类博士后，加大经费投入，提高了博士后薪酬待遇，拓展晋升通道。发展专职科研队伍，出台《山东大学特聘科技人员管理暂行办法》，鼓励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专职科研队伍，集聚多方资源，为跨学科、跨领域交叉学术研究、科技成果转化、产学研一体发展提供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专职科研人员依托工作团队获得了很好的发展。

山东大学还改进和创新评价方式，实施多元考核评价机制，将教师岗位分为教学型、教学科研型、科研型、应用技术开发型和临床教师，根据不同岗位特点完善培训、考核、晋升体系，建立健全涵盖品德、能力、业绩、贡献等要素的分类评价指标，体现了不同岗位不同学科的评价重点和人才成长发展规律。

改革就是要充分调动和激发二级单位的内生动力和积极性，山东大学致力于深化“放、管、服”管理机制。放，就是厘清校院两级的人事人才职责边界和管理权限，赋予基层单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和人事人才管理权；管，就是在学校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和有机统一，建立二级单位工作目标责任制，完善人事、人才管理 KPI 考核体系；服，就是要加强生活条件保障，努力提供有温度的个性化服务。（摘自 大众日报 2018-11-09）

## 南通大学：深耕新工科人才培养特区

南通大学张謇学院今年 9 月迎来了首批新生，来自该校机械工程、电子信息等 5 个工科学院、12 个不同专业的 30 名学生，通过层层选拔，从 243 名新生中脱颖而出。这是该校面对新技术和产业革命，以新工科建设为契机，探索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推进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一次大胆尝试。

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是南通大学创始人。“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是张謇留下来的教育理念，也是南通大学多年来始终坚守的办学方针。新的时代，该校在办学实践中，传承和弘扬了张謇的教育思想，并融入新工科建设，探求实现人才培养与地方需求、拔尖引领的同频共振。

### 优化专业结构，学科发展锚定“新工科”

新工科改革的核心是建立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作为地方高校，应对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发展起支撑作用。近年来，南通大学积极调整专业结构，通过学科顶层设计锚定新工科发展前沿。

2018 年，学校通过对原有 100 个专业的调研，坚持“发展重点专业、扶持新兴专业、优化竞争专业”，继续加强品牌专业、重点专业的建设和办学不满 6 年的新兴专业建设，建立竞争发展专业评估机制，实施绩效考核和滚动式评估。

“新工科教育不是培养年轻的‘机器人’，而是激发年轻人去创造。”该校电气工程学院一直秉承该办学理念。早从 2008 年起，电气工程学院就开始探索凝练出适应地方综合性大学

的“理论知识—工程实践—集成创新”电气类人才培养模式。围绕“通识、基础、专业”课程群增设多元课程，把创新教育课程、电气类新技术专题、经济与管理、法律与职业伦理等引入课堂。正是得益于新工科人才培养的提前布局，该校电气学院学生在课外科技竞赛中参与率达100%；学生近五年来获得国家级竞赛奖励达120余项；80%以上毕业生成为创新型中小企业和上市公司技术管理骨干……该学院成为学校首个通过国际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学院。

### **对接地方需求，人才培养嵌入“产业链”**

作为教学研究型大学，学校明确学术型与应用型并举的人才培养定位，实践采用校企联合，建立“嵌入产业链”的人才培养模式，面向企业需求，加强创新能力培养，培养适应社会发展趋势，能够进行工程创新的应用型高级人才，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课堂教育方式，不搞填鸭式的教育，将学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学习潜力、创造力激发出来。

“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南通市当前正在建设轨道交通，急需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方面的技术人才，交通学院为此专门引进了该专业方向的12名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整合了计算机、机械、电子、通讯、管理等多个学科的教学实验资源，组建了以智能交通工程为背景的教学、科研和实验团队。学校的智能交通综合训练中心，全尺寸交通沙盘仿真模型让人眼前一亮，交通检测器、信号灯、高清摄像机、信息发布屏、收费匝道等智能交通模拟设备应有尽有。交通设备与控制专业的学生们正在进行高速越野车转弯试验，这里成为学生们提升专业能力的演练地。

在人才培育终端，学院改变以往分散式实习模式，改为学院将学生安排到德邦物流、海康威视等行业龙头企业实习。通过带薪实习，企业以准员工的要求对学生进行严格考核，将企业育人与学校育人相结合，建立校企共育人才培养机制。

### **跨界整合资源，拔尖引领探索“新模式”**

创新教育不仅需要企业的全情投入，更需要有人才的鼎立支撑。在建好重点专业+特色专业的同时，学校依托重点学科，整合优质资源，建立跨学院和学科的专业机制。作为学校人才培养的特区，张謇学院依托学校重点学科，整合众多优秀工科学院、优质学科资源，以智能科学为引线，采用个性化培养方案，聘请有实践经验的“工匠”为学生授课，并带领学生到企业生产一线，致力于将学生培养成具有新时代“工匠精神”的智能制造领域复合创新应用人才。

在人才培养方面，学生本科四年将分别围绕智能机电基础理论学科、专业基础科目、专业科目、产业应用进行系统学习。一、二年级以基础性教学为主，从实际问题出发，引导学生逐步掌握基础理论知识；三、四年级开始，学生根据自身特长选择重点研究方向，并适当嵌入研究生课程，带领学生到企业开展大量实践，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和发现问题的能力。

在新工科领域中，探索产学研合作的改革创新，坚持培养具有远见卓识、创新精神、责任担当的学术与应用并重型拔尖人才，未来，将会给南通大学带来更多的机遇与发展。（摘自 中国教育报 2018-11-26）